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〇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d)

| | | |
|--------|--------------------------------|-----|
| 【本刊专稿】 | 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 | 余汝信 |
| 【历史旧账】 | 从李迎希子女状告孔庆德说开 ——也谈武汉军区的历史纠葛 | 史维真 |
| 【争鸣讨论】 | 《一代将星孔庆德》诉讼案及判决是怎么回事？ | 信汉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

• 余汝信 •

严慰冰案，是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怀疑丈夫有外遇（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自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六年间，共投寄数十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句，辱骂林彪一家。严案于1966年春告破，严随即被隔离审查。关押近十三年后，于1978年12月被释放，旋即被大陆主流媒体称许为反林英雄，那些匿名信，被誉为“又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1〕

一边倒的舆论，总算在近来有了些变化。

今年一月，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提及，当访问人黄峥问“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情况”时，王如是说：

“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

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2〕

王光美女士说“叶群固然很坏”，坏在什么地方？没有说明。看来，王对叶群也不过是不得不虚晃一枪罢了，矛头所向，其实是指责严：“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件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

应该感谢王光美女士！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位具一定影响力的知情人士，站出来说了这么一些公道话！

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告一段落。不料，在座的刘源却又接过了他母亲的话头：

“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3〕

很容易意会到的是，刘源说以上话的本意，更多的是出自于对林家下一代的同情。惟未知是否因当时年龄还小，今天的记忆已不准确，刘源的话，却不难被有心的读者挑出一连串的毛病。

1．黄玫，是严慰冰江苏无锡老家张泾的一小山名。严慰冰1960年代写有长诗《于立鹤》（顺便说，这诗写得很蹩脚），〔4〕即提到此山。严以此山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一定是影射王光美。

2．据知情者称，严的匿名信并非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出，而应是暗指林豆豆的亲生父亲不是林彪。

3．据知情者称，林豆豆和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儿刘涛是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惟文革前林家与刘家并无私交。住在中南海外的林豆豆，从来没有踏足过中南海内的刘家，“还抱着平平哭”，也就无从谈起。

4．严慰冰最早的一封匿名信，投寄于1960年3月，此际罗瑞卿已不是公安部部长。据知情者透露，匿名信曾寄给当时正在清华读书的林豆豆（林曾在清华短期就读，后因不适应转至北大读文科），豆豆未敢告之父母，将信悄悄交予林办秘书处置。秘书直接上报予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即告之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严针对林家的信，都是投寄到林家住处或有关场所，应是林办工作人员或林的家人先收到信再上报，断无倒过来罗先发现信再告之林家之理。

5．假设如刘源所言，罗瑞卿将此事（况且尚未破案！）告之不谙世事的两个小孩，又叫林立果转告其父母，有违做人的基本准则，有违常理。而更重要的是，据知情者透露，为免体弱多病的林彪受到刺激，叶群、林家儿女及林办工作人员案发后从来没有将匿名信一事告之过林彪。

刘源是好心说了过头话。接下来更糟糕的是，访问人黄峥自己又加了一段似评非评、似注非注的东西：

“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5〕

有人说，黄峥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惟根据以上文字可以断定，这位研究员对以上所谓破案经过绘形绘色的描述，名为“据说”，实则道听途说，并没有经过自己切实的研究过滤。

1．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绝非是黄峥所言的“巧合”。

2．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1965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1965年12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1966年2月20日视察济南军区），此期间，叶群除自1965年9月部分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四清及11月底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一两天时间外，从未离开过林彪身边。直到1966年5月10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叶方随林回京（林参加刘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个1966年春天，叶群都在华东，如何又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现身？

3．所谓“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即所谓“四副（党、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叶群那年春天果真在此间出现过，又岂能不知进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物？何以能为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就喋喋不休失了身份？再说，七号房内免不了遍布警卫及工作人员，岂会任由两位贵客吵骂而袖手旁观不加劝止？

4. 一个巴掌拍不响。退一万步说，两人果真吵了起来，你严慰冰就没有责任？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批判材料“揭发”，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严“一次到‘黑七号’来，不报姓名，警卫人员不认识她，不准她上楼。这下子惹恼了这个‘部长太太’，回去向旧市委大发脾气。旧市委赶紧向百货大楼挂电话，把警卫员训斥一顿。此后，……成了‘黑七号’的常客。她把‘黑七号’看成是自己的私有，什么地方她也要去，就连库房也要进去转几转”。〔6〕群众组织的材料，未必可以全信。但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严之霸道及横蛮无理，不也就跃然纸上？！

5. 再退一万步说，假设两人果真吵了一架。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小事，叶群也没有“仗势欺人”去中宣部告严，严怎么就非得要到总政去告叶？叶群不仅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夫人，且更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夫人，本人1965年已是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相当于军一级干部，且组织关系不归总政而属总参党委管理。谅你总政“负责同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接纳严的投诉。

6. 又假设总政“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接纳了严的投诉。1966年春天，林彪远在离北京两千里之外的苏州，这位“负责同志”无论怎么认真负责，惟其是否“真的”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屁大的事，专程从北京跑到苏州，“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叶群当时是“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见林的一切事宜都得通过她（据知情者透露，即使在四清现场，叶群也要人架设了直线电话，可随时与苏州及北京联系），这位“负责同志”要代人告叶的状去见林彪，又如何通得过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林办主任”本人这一关？

7. 据林办工作人员公开的说法，至少是自1960年代初以后，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每天只是“听”不超过半小时的要事与文件摘要汇报。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半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且“觉得这字面熟”？

如此说来，一言以蔽之，黄峥的“巧合”说引出的一番“破案”经过，纯属向壁虚构而已。

值得仔细分析一下的，倒是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对其妻的判断。

陆定一说，严慰冰之所以要写匿名信，是精神有毛病。这总比二十多年前严的亲属称严此举是出自于对叶群、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向事实真相进了一大步，值得肯定。陆定一说：“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

经查证，陆定一自延安时期的1944年起，已是中宣部部长。1952年9月，突然被降为副部长，中宣部工作，暂由胡乔木副部长主持。降职的原因，陆至死也弄不清个所以然。时接替陆的，是习仲勋。那么，陆说的所派之人，指的是胡还是习？胡、习又受谁所派？

1954年7月，陆定一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其时，应没有谁再敢“迫害”陆夫人了罢！

惟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痛快淋漓而又令陆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陆定一自此也就走了下坡路。到1966年3月，毛甚至声言“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者，陆定一

是也！（7）

1966年4月28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4月30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5月18日，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8）

以上为中央文件的原文。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林彪当时所讲的原话，还是事后经人整理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的文本是迟至当年9月才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目前已公开的林彪讲话，绝大部分是别人事前代拟或事后经人整理的，这篇讲话，也不例外。故而单凭这篇讲话，难以判断此时的林彪对匿名信一事到底知道了多少？

除却上述讲话之外，有关林彪对陆、严及有关匿名信一案所涉的讲话、批示、甚至什么“处女证明”等等，传闻甚广，不一而足。但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故而，皆可视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内中提及：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诰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9）

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谈及严案：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10）

刘少奇说严案“两年前就发现了”，“发现了”是个什么概念？令人有些费解。刘是说两年前就已知道是严干的，而彭真却不去处理，以至“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还是两年前发现了匿名信而彭未去积极破案？从字面上看，刘似乎说的是前者，那就更令人费解——当时彭真怎么敢那么做？！

不过，目前所能看到的刘少奇这个讲话，大抵仅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版本。群众组织的東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就是了。

陆、严分别自1966年4、5月被隔离、关押。严于1967年2月，陆于1968年4月分别被移送到秦城监狱。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但由于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未能出狱。直到1978年12月，陆、严两人方被解放。（11）

屈指算来，陆、严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其中1971年“9·13”事件后七年。要说“迫害”，这后七年的“迫害”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林彪、叶群头上的了，那么，算在谁的头上？

还是让我们回到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的话上来吧。

陆定一说：“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据《陆定一传》，陆是1952年底从苏联回到北京的。以陆本人的说法，自此严就经常与他吵架。吵架是否事实，又为什么吵架，本与外人无涉，但这样经常性的吵架，是否就是“神经偏执症”的症状之一？我们觉得应该深究的是，文革前陆定一权倾一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又是国务院副总理，恰恰其时，经常与他吵架的严慰冰，却是他的向中央备案的机要秘书！（12）换言之，陆定一须阅看、经办的一切重要机密文件，首先必须经严之手！陆以一个患有神经偏执症者，充当此等重任，陆自己是否昏了头？

严慰冰于1930年代到延安。与她几乎同时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女性，不少先后与革命的领导者结缘。青年时代的热忱，无庸否定，她们当中，也应不乏优秀分子。但无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个别人的性格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不仅没有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在革命胜利后随着夫君地位的显著变化而放大，如睚眦必报，如喜怒无常，如撒泼放刁，如对权力的强烈欲望。文革中的江青，则是最好的例证。江青的一些表现，不也似患有“神经偏执症”？

参加革命前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王光美，道德修养当然与江青之流有着天渊之别。但夫人干政，王却也未能见俗。

王光美女士在访谈中提及她的《桃园经验》，还有点儿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实，《桃园经验》使一大批普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遗憾的是，王似到今日也未能觉悟。如萧喜东先生所言：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批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

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13）

长达百页的《桃园经验》即《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1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全国。王在访谈中引用刘少奇的话，是“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的。（14）

更有甚者，刘少奇在不久后的《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中，指责江苏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认真学习和研究”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刘训斥道，江的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而“中央”“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员学习河北抚宁工作队的经验总结，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15）

这么说来，刘少奇也是一时昏了头。

本来，王光美女士能为严慰冰案说了那么一些公道话，已实属不易，但如果我们以更高远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出历史上的闹剧，窃以为还是缺了些什么。那就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仅仅从个人品质的优劣去解读往昔而不是从制度设置的落后性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的意识不仅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还相去甚远，而且，也实难彻底根除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的可能。

这，未必就是危言耸听。未审王光美女士然否？（2006年4月）

注释：

（1）严昭：《涅槃之歌——记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页108。严昭是严慰冰的胞妹。

（2）（3）（5）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392—394。

（4）见严慰冰：《于立鹤》（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6）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联络站：《经济批判》，1967年4月28日

（7）“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1。

（8）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500号，1966年9月22日。

（9）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77号，1966年5月24日。

（10）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页103。

（11）参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2）国务院秘书厅编印：《通讯录》（1965年9月），页1。《通讯录》记载陆还有一位秘书宋广渭（即后来《陆定一传》的作者之一），名字排在严慰冰之后。

〔13〕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14〕同〔2〕书，页364。

〔15〕《中央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4〕672号，1964年10月24日。

~~~~~

## 【历史旧账】

### 从李迎希子女状告孔庆德说开 ——也谈武汉军区的历史纠葛

• 史维真 •

◇ 活人骂死人，骂得对不对？

孔庆德（1911），一九五五年授中将，一九五五年秋后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七一年三月至七五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九八二年离休，目前身体状况尚好。

李迎希（1902——1981），一九五五年授少将，一九五五年春组建武汉军区时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八一年去世。李虽为少将，却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此情况在全军罕见。李虽为少将，却是行政六级，也是全军少见。六七年二月后因文革中的问题停止了工作，至七四年解脱，七五年整军时离休。

2001年1月，《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的封面没有署名作者，在后记中有编写者的名字：屈德骞 郑珠滨。该书是个传记，写的是孔庆德的生平事迹。该书在文革的章节中不点名地提及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搞“夺权”，影射李迎希同志。

2001年5月，李迎希的子女写信给广州军区党委（武汉军区撤消后，湖北归属广州军区），提出《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对其父的描述是捏造和歪曲，同时是违背文革后党组织对李迎希所作的结论的，要求广州军区查处。广州军区告知李的子女三点：一，《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如有问题，由作者文责自负；二，既然书中未点名，就不要对号入座了；三，如有争议，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解决。

李迎希子女于2002年初开始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同年四月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给予复函：该书“是孔庆德同志自筹资金，委托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有关人员撰写”，希望双方协商采取私下和解。李迎希子女委托律师找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联系协商问题，被推拖、拒绝。

2002年6月，李迎希子女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起诉孔庆德、屈德骞、郑珠滨和解放军出版社损害其父名誉权，要求被告公开承认错误，消除影响。武昌区法院认为案情特殊，移交武汉市中级法院。市中级法院未正式立案，只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中级法院写报告给湖北省高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批示：由武昌区法院审理该案。此后，武昌区法院又进行调解，仍不成。

2004年9月，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副处长王鲁江提出，希望李迎希子女能撤诉，并透露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俞正声关于“不要让孔庆德承认错误”的批示。李迎希子女说，不相信俞正声会这样说，否则，岂不是为这个官司定了调子？然而，后来武昌区法院就是判李



迎希子女败诉，其判词明显颠倒是非、自相矛盾。

武昌区法院于2005年5月30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审理了该案—原告在开庭前表示应公开开庭，但法院仍依照被告的要求采取了不公开开庭的方式。被告方由孔庆德的女儿和一名律师代表孔出庭，孔的另一位女儿和律师代表两位编写者出庭，解放军出版社派来代表出庭。原告方出庭的是李迎希的三个子女及律师。同年8月9日，武昌区法院判决李迎希子女败诉，驳回其诉讼请求。

#### ◇ 历史上相关事实（上）

《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所谓李迎希“夺权”，是武汉军区在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缘起与李迎希和陈再道、钟汉华之间的矛盾有关。

文革前夕，六六年初的军区党委常委交心会中，李对陈、钟有很多批评。六六年春，兼任军区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武汉军区领导班子不团结。毛向王要了有关材料去看过。

文革后，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同地方一样开展运动，及六七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陈、钟在军区常委会上提出：有关文革的问题，首先由军区文革办公室解决，解决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决，再解决不了才找陈、钟。李表示异议：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解决问题，党委书记（陈再道）要挂帅，文革办只是党委领导下的工作班子，我们（指副司令、副政委）也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去做工作。但是，后来实际中基本是按陈、钟的意图行事。当时常委会分配李迎希负责后勤系统的文革运动，之后，李迎希接见后勤系统搞运动的群众都是由军区文革办安排的。

在5月30日庭审中，孔庆德方的证人证言说，当时所有军区常委受到造反派冲击，唯独李迎希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李迎希是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子女说，当时李迎希也受造反派冲击，只是军区大院基本没有群众揭批他的大字报；但没有被群众贴大字报的常委并非李一人，不能以是否受到群众的冲击来确定是否支持造反派，以至确定是非。

六七年一月上旬，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会议，并委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在陈、钟离开这段时间临时主持党委工作。此时前后，军队文革运动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在陈、钟离汉前，信阳步校的造反派到军区大院，要求孔庆德接受对他在信阳步校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陈再道听了文革办的报告后，让唐金龙副司令员陪孔一起去见群众，陈指示唐说：“你告诉他们，他们不能这么搞！”孔、唐见这些造反派时，唐严厉批评了这些造反派师生。但孔对这些造反派说，自己有“军事路线”错误，接受大家批判。结果，造反派将火烧到唐身上，将原来准备给孔庆德的高帽子，转带到了唐金龙头上，并将唐的领章、帽徽扯掉。

当时，受造反派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结合本单位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等实际，猛攻吕，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吕找军区常委（吕不是常委），常委们均不表态。吕很悲愤，说：“你们是舍卒保车”。

一月二十日，陈、钟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当晚叶明召开常委会，李迎希听叶明讲了会议内容后说：“谁是贺龙分子？这个会不如不开”。叶说，还是按陈、钟的指示办。由于军区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龙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大字报，会议形成的疑问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会上不满地说：“要在这里（指

与会者）揪贺龙分子，那只能是我了”！会后数小时，即一日二十一日凌晨，唐金龙就在家开枪自尽。祸不单行，同日上午吕炳安死在军区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验尸结果：死亡是由于凌晨前后服用大量安眠药。

一夜之间，两位领导人身亡，引起人们猜测和议论，还出现种种谣言。有很多大字报说是“杀人灭口”，还有大字报讲有消息说下一个被暗杀的人是李迎希。造反派提出要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迴避造反派的质问，军区领导人纷纷走避。叶明的秘书王书正说，叶当时很少到军区，“一天到晚到处躲”。

唐、吕事件后，李迎希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再道，说军区机关和党委基本瘫痪，请陈、钟至少先回来一个，主持解决当前问题。陈说，还在开会，不能回去。李说，现在群众追问军区领导的问题主要是军区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可否承认？陈说：“绝对不能”。陈要李学南京军区的张才干，造反派怎么闹，张都不表态。

李迎希得知军委当时并没有开会（从后来的资料来看，陈、钟在北京的两个月时间中，两至三次会加起来的时间不足半个月），于是在一月下旬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唐、吕事件后，军区机关、党委基本陷于瘫痪，请军委让陈、钟回军区主持工作，解决问题。而陈、钟则怀疑李要求他们回去是想让群众揪斗他们。分歧、成见、猜疑，导致将同志视为异己，甚至敌人。

一月下旬，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张广才（1900—1970）来找李迎希。此前，张广才因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经军区党委批准在咸宁养病。张听说唐、吕事件后军区大乱，军区领导中基本上只有李一人能去机关上班，于是从咸宁返回。张对李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哟！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样顶着，我要帮助你”。李劝张说：“现在群众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出现唐、吕的事，情况很复杂，既然你已经停止工作去养病，何必再陷进来”。但张执意同李一样去机关上班。结果张一到机关就被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弄得头晕脑胀，没两天就住进了军区总医院，但张仍坚持在不看病时到机关来。

二月初，陈再道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家的副司令员姚哲、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说：“你们身边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这里所谓的“敌人”就是指李。此事被知情人捅了出来，并见诸于军区大院的大字报上。至此，军区领导班子分裂了。在此之前，李迎希虽与陈、钟有分歧，但基本上还是学张才干，把矛盾限制在党委内部；在此之后，李的言论则开始有些脱离这个原则。如在回答群众提问时说：“我在党委是受排斥的”、“如果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等。李在群众中这样说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后来就把这些讲话，上纲说成是李煽动群众反军区党委，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陈再道给姚、孔、杨、韩的电话是将与李迎希工作方法的分歧，推向质变的开始。“7·20”事件以后披露：钟汉华得知李给陈的电话内容后，向陈进言：“李迎希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打倒你这个党委一把手”。

二月初的一天，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向李迎希报告，军区大院驻进一个排，造反派说是来镇压群众的，双方争执起来，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李问这个排是谁派的。信说是副参谋长张显扬派的。李问张显扬，张说是按姚哲副司令员指示派的。李让张、信请示姚。张、信说找不到姚。李指示张：暂时把这个排撤出去，明天请示姚后再定。这件事使两方面的人对李产生了误解：一是军区上层中有人认为李反军区党委；二是军区机关和院校的造反派认为李是支持了造反派。后来李被打倒后申辩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反对谁和支持谁的想法，那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来看，笔者认为李的申辩是有道理的：一，当时张显扬和信俊杰这些机关负责人找不到姚哲来处理此事，能够找到的军区领导人只有李迎希，李在此时处于难以迴避的

处境；二，不能要求李当时可以下令这个排对那些造反派采取强硬措施，这种观点既不现实、也不客观，因为对军队造反派采取抓捕和拘押是军委于二月十一日制定七条规定以后才有的事情。李决定暂时撤下这个排，让张显扬找到姚哲后再处理，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二月六日，李迎希接到军区党委办公室转达叶明副政委的通知：在礼堂开大会，在家的常委都要参加。《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描述此大会是李伙同造反派召开的（关于这一点，在2005年5月30日庭审中被告未拿出任何根据，所提供的六位证人完全不符合在此问题作证的条件）。虽然大会有一些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参加，但从军区领导主持和机关干部参加的情况来看，此会只能是军区党委主持召开的。大会开始是叶明副政委宣布军区党委关于机关停止“四大”、解散“战斗队”的六条规定。叶讲完后会场出现混乱，其原因是造反派说六条规定是“镇反群众的黑六条”。造反派担心受到“镇压”，说姚哲派兵镇压群众，“要求姚哲将作战工作交给李迎希”。李迎希当场表示反对，说：“我不能接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大会中还出现有人要军区常委们签字保证李迎希的安全问题。是谁先提出的，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李迎希自己提出来的；为孔庆德作证的人说是李的秘书刘于淮提出的；李迎希子女根据其父所讲，是群众提出来的，李反对，但大会很乱，谁也控制不了。

二月六日大会后当晚，军区文化干部、职工（俱乐部放映员）约六、七人到李迎希家，要求李接见。这些人乘李的秘书上楼向李通报的空档，在桌下安装了录音机。李来后，这些人声色俱厉地指责李不接管作战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众。李仍表示拒绝，解释说作战工作属党委分工，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后来在审查批斗李迎希时，这次李接见这些造反群众被说成是李同这些群众策划夺权，《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秘密开会，逼姚副司令交出军权”。但是，第一感觉就是大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同文化干部、职工策划“夺军权”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后来在批斗李迎希时播放这个录音，其中谈话内容有群众提：“你来接管作战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众提：“你拿不拿得下来”，李答：“我指挥过七个军”等。以后在1973年1月6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将李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这个结论的唯一内容只有所谓“夺军权”，所依据的就是这天晚上所谓“秘密开会”的录音。

李迎希本人在1967年至1973年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中提出，当晚被这些群众纠缠约三个多小时，后来批斗时先后放的录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半小时左右，一个只有五分钟左右的，都是伪造的。当时自己是十分明确地拒绝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战工作的，而批斗会中所放录音完全没有这些话。

李的申诉报告还提及，姚哲调来武汉军区后，军区党委相当长时间未给姚安排具体工作，“是我在党委主动提出将作战工作交给姚哲同志的”，“后我准备退休，向党委提出不再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并赞成姚担任此工作”，“由谁分管某项工作是党委集体决定的，不能由个人决定或‘夺权’，我为党工作几十年，对这个组织原则是十分明确的”。

据《一代将星孔庆德》称，二月六日大会当晚，也就是李迎希在家应付那些群众纠缠之时，叶明到了位于孝感的十五军军部，在那里打电话向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汇报二月六日大会的情况。陈、钟向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做了报告，徐帅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此时徐帅和陈、钟并不知道二月六日晚所谓“秘密开会”及录音之事。认为李“夺权”，徐帅仅凭陈、钟的看法，而陈、钟的看法也只来源于从电话中得知的二月六日千人大会上的情况。有陈、钟被武汉来电话误导的因素，而主要是陈、钟对李早有猜疑，这种猜疑决定了他们对有关情况的判断。历史地看，这当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整体性的悲剧。

二月十日，中央军委给武汉军区电报：“请李迎希副司令员、张广才副政委立即来京，商谈问题”。当晚，李、张乘武汉空军派的一架飞机赴京。二月十一日后，徐向前和军委文革副组长王新亭在京西宾馆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会上徐帅说：“军委八条命令下来了，为什么武汉军区还稳定不下来”。李迎希说：“群众说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检查，因此还在闹”。徐对李、张说：“你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徐问李、张：“你们说要打倒陈再道？”李说：“我虽与陈司令有分歧，但没有说过打倒他”。徐说：“是谁说要打倒陈再道”。李、张说：“是群众这样提”。徐道：“群众？群众里面有坏人！”在李反映军区的情况时，徐屡屡打断李的讲话。李对徐说：“你不要插我的话嘛！”徐拍着桌子对李、张说：“你们的问题是抢班夺权，你们要检查！”李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说：“你少来这一套”。说完拂袖而去。陈、钟也随徐一起离开会场。

王新亭对还坐在会议桌前的李、张说：“你们呐，就是摆老资格。”李指着徐向前刚才坐的位置没好气地说：“谁有他资格老！”会后，军委办公厅通知李、张的秘书：徐帅指示，李、张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及对外联系。于是，李、张在京西宾馆处于软禁状态。

据“7·20”事件后揭露：在二月十日晚，钟汉华一直等待武汉方面的消息，当秘书报告说李、张所乘来京的飞机起飞时，钟鼓掌曰：“调虎离山成功了”。后来钟在北京的检讨中交待，让军委调李、张来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从有关情况来看，在扳倒李、张这件事上，钟起到了开球的作用。李被打“夺权”后写申诉报告说，自己在文革前批评陈、钟，但陈、钟记个人成见，文革中借机打击报复。事实上，陈、李之间即使有个人成见，也不深；而钟、李之间显然有较深的个人成见。文革前李曾批评钟：在别人给陈再道提意见时一味的维护陈，“象陈的小媳妇”。钟当面忍了这口气，李倒后公开说李是“侮辱过自己的人”。

有关资料显示：红四方面军的前身鄂豫皖红四军于一九三一年初成立后，徐向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张广才是该军三十二团政委，陈再道是张广才所部排长，王新亭是三十团政治处主任，李迎希是该军二十九团营长，许世友是二十八团营长。孔庆德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于三一年二月的“六安兵变”后投向红军。川陕根据地时期，张广才任四军政委时，陈再道在该军任师长。长征后期的三六年七月，陈再道任四军军长，李迎希和张才千时任该军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据《一代将星孔庆德》所述，孔当时是该军三十六团团团长。以上这些人在红军时期都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部下，只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初期，徐向前未被派往鄂豫皖前，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再道等属黄、麻起义的一支；而李迎希属商南起义的一支，其领袖人物许继慎、周维炯等后来在张国焘搞的“肃反”中被杀害，李迎希当时已任独立师副师长，也被以“第三党”罪名逮捕，差点被枪毙，被战友保下来后，在四方面军一直得不到重用。抗日战争时期李迎希在120师，解放战争去了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时任山东兵团参谋长，连续几场大战下来，在华东的将领中声名鹊起。1938年，陈再道向刘伯承要了几个连，打出一个不小的冀南根据地，对这一成就，党内有“任穷之德、再道之勇”一说。孔庆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是陈再道的直接下级。四九年三月，桐柏军区部队改编为五十八军，时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的孔庆德任该军军长，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任司令员）。

二月中旬后，武汉军区党委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军区机关和所属单位进行整顿。其中主要是解散造反派组织、拘捕造反派骨干、对参加过造反活动的群众搞请罪过关。在动员进行整顿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孔庆德说：“李迎希想当司令，张广才想当省委书记，这两个老家伙这么老了，土都埋到耳朵根了，还这么有野心，在北京把他们打上手铐脚镣关起来了”。孔还说：“张广才根本不会打仗，他没有牙齿、镶金牙，就是不会骑马摔的”。

李迎希得知孔这些讲话很恼火：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甚至批判，搞这种人身攻击就不可以。“7·20”事件后，已解除软禁的李迎希在首长宿舍院内与回家路上的孔庆德相遇，怒斥孔是“走狗”、“小爬虫”。孔连忙就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过去，孔对陈再道唯马首是瞻，但对李也是很尊敬的，在军区领导人中，与李迎希来往最多的是孔庆德。但在扳倒李时，孔喊得最响，象报了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六七年四月初，军委文革副组长徐立清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李对被说成是“破坏军队稳定”、“抢班夺权”表示不满，徐立清说：“军队文革搞起来了，后来急刹车，确实不是能一下子停下来，陈再道、钟汉华对你们的问题看得过重了，你们回去在党委作个检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四月八日李迎希、张广才返回武汉，没有被安排参加作检查的党委，而是保卫部门按军区党委决定将李、张软禁。军区多次召开机关干部会批斗李，因李不服，遭到过武斗。李问为什么搞武斗，被答曰：“你过去不是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吗？你就正确对待吧”。李写信给徐立清反映自己回武汉以后的情况，没有回音和反应。“7·20”事件后，李迎希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找徐立清问收到信没有？徐说：“我收到你的信后转给了肖华，肖华没有表态，我也没有办法”。

大军区中受文革冲击最严重的是武汉军区，主要原因是武汉“7·20”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去北京后被撤职；八月一日，姚哲、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到京参加学习班。八月上旬，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徐向前于二月处理李、张的事情，指示通知李、张也来京参加学习班，并指示徐向前讲清楚此事。徐给周写了一封信，说当时陈、钟向军委报告说李、张搞夺权，自己并不大了解情况。信后附军委文革所做徐在京西宾馆召集陈、钟、李、张开会的记录。该记录上有一句话说：“李不让徐帅插话，态度狂妄”。李、张于八月十天左右到京后，在一次中央学习班会议上，周恩来进入会场见到坐在会场后面的李迎希，于是招手道：“李迎希同志！”李站起来后，周示意坐下。这时吴法宪跑来拉李坐到前排去，李把手抽开，说：“我就坐这里”。李于一九五零年任军委工兵副司令（当时没有司令），正值抗美援朝，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李常被周召去汇报和研究问题，是西花厅的常客。周对李的工作能力比较赏识。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81）8号文件），指出李迎希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否定了过去将李的问题说成“夺权”，为李迎希问题划上了句号。但时隔二十年，《一代将星孔庆德》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又讲李“夺权”，等于在推翻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

2005年5月30日庭审中，孔庆德的代理人及证人证言反复说，李在六七年初是“支持造反派的”。这种将当年的具体问题搞成一个简单化概念化的说法，混淆了有关历史事实。第一，李迎希未介入地方的文革；第二，李迎希接待群众是当时工作范围内的事，没有支持哪一部份的群众。李只是表示应正确对待参加运动的群众，如果这些与当时一些同志的想法和做法不同，也属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属于正常的范畴。李迎希说过一些错话，这要放在当时环境等客观原因去看待。为什么一些人一直以文化革命的思维方式来诠释李迎希的言行呢？

军队文革本来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文件下开展起来的，六七年二年前后，中央急需军队稳定下来投入“三支两军”，对军队文革来了一个急煞车，李迎希未能跟上这个形势，这应算李的错误。他这个错误有主观的因素，也有一时政策不明朗的客观原因。二月中旬以后，军队内部的整顿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应以达到稳定为目的，超出这个范围的做法，把按中央指示精神起来搞文革的群众当作“坏人”来整当然是不对的。武汉军区动用部队，进入军事院校、文化卫生单位拘捕军内师生、干群，难道是一个符合“八条”的理性做法吗？

当时陈、钟认为李“搞夺权”，与陈、钟对李的成见有很大关系，加上全国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也不免让陈、钟有点神经过敏。徐帅听信陈再道、钟汉华的一面之词，将李迎希的问题看作“抢班夺权”，也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错误。

#### ◇ 历史上相关事实（下）

六七年九月底，中央学习班负责人谭甫仁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说根据周总理批示：李、张结束学习班的学习返回武汉。谭说：“过去说你们‘夺权’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是陈、钟整你们”。谭并将周恩来的批示给李、张看了。李迎希说：“我们回去以后，工作问题怎么办？”谭说，工作的问题由曾思玉、刘丰安排。此时武汉军区原领导人中只有李、张先离开了中央学习班。周恩来为什么要让李、张先回汉？原来，陈、钟被打倒后，由林彪提议，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曾思玉从沈阳军区调来装甲兵司令徐国夫来武汉军区任副司令，炮兵政委张玉华来武汉军区任副政委，作战部长唐皎来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成立了军区临时党委。后来曾思玉、刘丰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干部不够用，要求继续调人来武汉。九月中旬，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二次到武汉，同曾、刘谈到这个问题，毛说，调多了不好，让曾、刘注意团结本军区（武汉）的干部。毛泽东于下旬返回北京，周恩来让李、张回武汉的批示就在毛回京后的第二天。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这次回汉反是他第二次被打倒的开始。

十月，李、张返回武汉后向曾思玉、刘丰报到，曾、刘的态度很客气，但当李、张表示在曾、刘的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时，曾、刘一下子沉闷起来，后来曾思玉说：你们刚从北京回来，工作的问题以后再说。显而易见的是，曾、刘不想让李、张工作，似乎有人不愿意按毛泽东、周恩来的意图去做。

此后，李、张一直赋闲在家，谨言慎行。后来曾、刘向中央报告说李迎希在这段时间插手军区的事情，操纵造反派，造成军队不稳定，是纯属捏造。前面提到，经过六七年二月后的整顿，军区机关已经稳定下来。“7·20”事件后，军区机关虽受到震荡，但人们在等待军区新任领导的政策方针。八月初（六七年），曾、刘首长将军区中层干部宋新安、宋乐山找去谈话，两位宋同志第二天贴出大字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原武汉军区党委。由此，“四大”、“战斗队”又开了闸。某种意义上讲，军区机关此后不稳定是曾、刘自己造成的，后来将责任推到李的身上，起码是政治品德很糟糕。

这段时间，有些机关干部来李家探望，这些人有谈到曾、刘主持军区以后的工作和人事问题，有人说工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有人说不少中层以上干部不被信任。李说，这些事情，你们应向曾、刘反映、请示，“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有些军队造反派找过李迎希，提出“7·20”前军区一些干部群众被打成“小李迎希”、“李、张反党夺权的帮凶”等，应该翻案、平反。李说，我的问题由组织解决，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找组织解决。李对这些造反群众也是保持距离的。六八年六月李第二次被打倒，李被说成“搞两个司令部，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干扰曾、刘首长的工作”等，这些说法在后来漫长的审查中证明都是子系乌有，曾思玉主持军区党委所搞的1973年1月6日《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对这段时间的事情只字未提。在这段时间，李没有工作，也就不会因公事与曾、刘产生矛盾；李也没有插手军区的事情，没有得罪曾、刘的地方，为什么曾思玉后来要整李？

李、张在家住了几个月后去找过曾、刘一次，向曾、刘提出，过去武汉军区搞的“李、张反党夺权”，现在应作平反。曾思玉挺客气地说：“你们的问题在中央集训班已经解决了，不是反党夺权，就不必再平反了”。但后来曾思玉还是以“反党夺权”的罪名将李迎希打倒了。曾思玉将一个翻过去的问题又翻过来，是何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姚哲、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原军区领导也结束中央学习班的学习返回了武汉。当时周恩来给武汉军区打了招呼，要原军区领导同志都出来工作。曾思玉、刘丰将李迎希、张广才找去谈话，让李、张去同刚回汉的姚、孔、韩、叶等开个座谈会。曾思玉说：“你们和他们是老伙计，情况熟，座谈一下，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李、张按曾、刘的意见去参加座谈会。李、张到军区四所与姚、孔、韩、叶等见面，这些共事多年的老军人，“7·20”前李、张被射下马来，“7·20”后姚、孔、韩、叶等被批得青红蓝紫，多少恩恩怨怨涌上心头，特别是站在自己曾经执掌大权的地盘上，竟有客于他乡之感，不禁“执手相看泪眼”。孔庆德见到李迎希同李久久握手，说：“过去我说了你那么多坏话，你今天还来帮助我，我真是感动”。李对孔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以后大家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座谈会上，李迎希首先发言，他颇动感情地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大家搞成这个样子，我感到痛心啊！”此话一出，众人俱下泪矣。李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说出了许多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机关干部的感受。座谈会上有曾、刘办公室的秘书作记录。虽然李只是为武汉军区在文革中受到重创而感慨，并无反曾、刘的意思，但座谈会透露出某种情绪让曾、刘会有何种认知和联想呢？李在发言中将“李、张反党夺权”问题、“7·20”事件的发生，及军区的干部受“7·20”连累等问题，都归咎于陈再道、钟汉华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所致。这些提法与曾、刘应没有任何矛盾，曾、刘本来就是打着打倒陈、钟的旗号入主武汉军区的。为什么曾、刘不能将座谈会上这些原军区常委都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要在这个座谈会后不久对李迎希大打出手呢？

孔庆德在座谈会上对李迎希说：“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为什么不拉上我们大家一起反对陈、钟”。李说：“我对陈、钟主要是在党委内部提了一些意见，这些你们都清楚。”其实，孔的话大大差矣，如果李拉人反对陈、钟，岂不是搞非组织活动，确确实实的“反军乱军”了吗？但就在两个月后，也是孔庆德，在曾、刘向他透露要打倒李迎希时，竟对曾、刘说：“李迎希在座谈会上要我承认他一贯正确，我就是回家当老百姓也不干！”

在李、张同姚、孔、韩、叶等开座谈会之时，曾思玉、刘丰在北京参加中央处理“杨、余、付”事件的会议。曾、刘回汉后，李、张去见过曾思玉，汇报座谈会情况，李迎希说，通过座谈会大家提高了认识，姚、孔、韩、叶等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很好。曾思玉表示满意。但时隔不久，在打倒李迎希的会议上，曾思玉竟当着姚、孔、韩、叶说：“你对他们就是揪住不放！”李说：“是你让我去同他们开座谈会的，座谈会上有你们办公室的秘书作记录，后来我向你汇报说他们都是改正错误的，我怎么揪住他们不放了？！”

打倒李迎希的过程是这样的：曾、刘在听取了李、张关于座谈会的汇报后不久，于五月八日又去了北京。五月底，曾、刘传达军委办事组通知：原军区常委到北京开会，会议内容是“解决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姚、孔、韩、叶和李、张、毕（毕占云）等乘专机赴京。这架飞机刚起飞，在家的副政委张玉华即开始在军区机关搜集“7·20”以前整过的李迎希问题的材料。同机飞往北京的老同志中在开会之前只有一个人得知了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这个人就是孔庆德。曾、刘在这些人到达京西宾馆后，将孔庆德单独找去谈了话。当天晚饭后，李迎希和毕占云一起散步时遇到孔，李同孔打招呼，孔态度竟然十分倨傲，与数小时前截然不同了。但李误以为是自己身边的毕占云的关系。解放初期，毕和孔同为河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任司令员），那时毕就因孔拍陈马屁而鄙视孔，毕于六五年由河南省军区司令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后，基本不理睬孔。但孔是李的常客，毕来找李时听说孔在就不进门。

第二天，在军委办事组组长和副组长黄永胜、吴法宪的主持下开始开会，黄永胜讲了几句过场话后，孔庆德第一个发言。孔说：“我在‘7·20’以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检讨认识了错误。但是李迎希在六七年二月违反军委八条命令，搞‘夺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李

迎希对孔说：“你这可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孔瞠目结舌。曾思玉立即补充进来说：“你李迎希是旧帐未算，又有新帐”。孔再讲：“你从北京学习班回武汉有活动，搞两个司令部，是黑司令，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干扰曾、刘首长的工作”。此时，与会者全都明白了这个会的真实目的。

这次在京西宾馆开了五次会，前两次是黄永胜主持，后三次是曾思玉代表黄主持。会议集中点是要李迎希承认六七年初搞了“夺权”，李拒绝承认，作了说明和解释，但被说成是“态度不好”。会后，曾思玉说李“抵赖”，黄永胜指责李是“典型的兵痞子”。

会后传达了林彪六月十三日十六时的口头指示：“李迎希这种人的不好，这次弄清楚了很好。应该把他留在北京，继续解决他的问题，不要让他回武汉。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还传达了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十一时给曾思玉的电话指示：“对李迎希的处理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同意这样处理。”曾思玉把中央关于将李迎希“留”在北京作检查的决定告知李迎希时，李说：“你们回去好好调查，澄清问题”。事后曾思玉说：“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六月十五日，曾、刘及原军区常委们返回武汉。此时，军区出现了一位新的李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化民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任命命令是这次“解决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的会议开始之时（六月初）。一切都已事先安排，打倒李与“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密切相关。

曾思玉回到武汉在军内外传达中央关于处理李迎希问题时，可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大会上讲李“夺权”、“乱军”等，把无中生有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手伸得很长”，“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就搞鬼”；又贬损李的工作经历，说：“他说他指挥过七个军，吹牛！我问许世友，许司令说他指挥七个兵”，“他是做机关工作的”（曾思玉忘了自己在红军、抗战期间任参谋、民运股长和团政治处主任的经历）；还为李的历史编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说：“他是破落地主，算命先生”，“有叛变过的可能”，而后来在曾思玉主持下搞的武汉军区党委《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对李的历史除了说是“出身贫农”外，不见曾思玉曾说过的那些东西。一位当年听过曾思玉有关李迎希的讲话的军区机关干部说：“当时的说法说曾思玉是林副主席选派到武汉军区来的，所以大家对他讲李迎希那些东西是相信的，但又觉得有点离谱”。曾思玉当时在大会上讲得一时兴起，说：“李迎希是啦痢头，秃顶了”（参加大会的军区机关干部大多见过李迎希，李是毫无秃顶迹象的平头，而曾思玉自己倒是典型的秃顶）。

这次打倒李迎希，是林彪指使黄永胜、曾思玉干的，还是曾思玉请求林彪、黄永胜支持干的，只有将来的解密才能彻底弄清楚。但搞掉李是林、黄、曾预先策划、共同实施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为什么搞掉李？林彪的口头指示中“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这句话道出了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李迎希获得解放。李迎希同韩东山谈到，七三年一月六日军区党委所作《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将李的问题认定为“反党夺权”，为什么党委能通过这样一个错误的东西？韩说，曾思玉在的时候，很多事情由少数人决定，事后大家才知道；姚哲在“9.13”事件前对这种作法有意见，曾思玉就整姚。很显然，李、张于六七年十月回汉后，曾思玉不肯让李、张工作；姚、孔、韩、叶于六八年三月回汉后，曾思玉对这些老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采取拖延，是因为有人对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让李、张、毕和姚、孔、韩、叶全部进入领导班子，曾思玉怕压不住台，这位“新领导”可能“动摇”。那么如何“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呢？“杨、余、付”事件后，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通过打倒最有可能反对曾思玉专权的李迎希，顺势除掉了张广才、毕占云，再以李化民取代姚任第一副司令员，目的是使领导班子问题达到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局面，如再有人不服，可各个击破，就象对付姚那样。



“9.13”事件后，中央认为，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事，问题较大的是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但在已经公开披露的事情中，武汉军区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只有刘丰的通风报信。其实问题在武汉军区远不是这么简单。

#### ◇ 历史上相关事实（续）

“7.20”事件前的李迎希问题，是文革中党内思想斗争发展到纷纷打倒不同观点的人；而曾思玉入主武汉军区后的李迎希问题，其背景是文革中的权力再分配，林彪地位上升后要占据更多的权力，于是曾思玉这类人应运而生。不能说林彪、黄永胜选拔的人就不好，但如果靠整人、害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好了。文革中，南京军区发生的“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乱军夺权”事件，也是文革中党内思想斗争发展到打倒不同观点的人的一例，与李迎希问题类似。王、林、鲍面对文革的混乱，工作中也许有些错误，但许世友给他们扣上“乱军夺权”，更是极其错误。由于整王、林、鲍的是许世友，不同于整李迎希的是曾思玉，所以林彪集团没有加害王、林、鲍。王、林、鲍于70年后调离南京，到其它军区工作。1980年12月，南京军区党委正式发文，为王、林、鲍平反。

文革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李迎希到北京，同陈再道见过一次面。这是十多年前北京集训班时李面对面批过陈后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的心情很复杂：两人相识于红军时期，武汉军区时期陈统领军区大权，李总管各种军务，相互支持和配合；然而文革中的分歧和误会造成相互杀伐，又都被林彪集团打压，以致都伤痕累累。尽管两人在文革中的具体问题上仍有不同认识，但是和解了。他们互致歉意，“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希望用和解消除各自的心结。他们这次会面与和解也许和他们各自的思想变化有关：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李迎希说：“这样镇压群众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搞得乱七八糟，群众不满嘛”。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时，陈再道在七位上将给中央的请愿信上签名，反对派部队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文革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两位老将军：滥用群众运动，受苦的还是群众；用军队对付群众，军队将自我抹黑。李迎希于1981年去世后，陈再道写过一些回忆文革的书。本来，写到文革中的武汉军区，是很难绕开李迎希问题的，但陈只字未提李。显然，陈认为李有错，但不愿批李，再说自己那样整李也是错的，干脆不提。

在陈、李这次会面中，陈再道说：“你和我犯错误，是认识问题，那个孔庆德是道德品质问题”。九十年代初，70年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谢胜坤看望陈再道时，谈起陈任武汉军区司令时的各位领导，陈说：“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七十年代中期陈再道重新任职后，到过几次武汉，孔求见，均被陈拒绝。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孔庆德作为陈再道的直接下级，由团长提拔为旅长，又从旅长升任纵队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成立时，军委原本没有考虑孔庆德进武汉军区领导班子，孔向陈请求，陈向军委报告，将孔调入了武汉军区。从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1965年底的批“大比武”，到文革中军事院校造反派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孔庆德均受到冲击，陈也是一路保孔。然而，“7.20”事件后孔见陈再道大势已去，对陈反戈一击，这个反戈并非迫于形势所作的政治表态，而是为了自保，对陈进行出卖。在六七年十一月一次批斗会上，孔质问陈：“你说‘八条命令’是怎样来的？”陈说：“是军委制定的”。孔说：“你放屁！你说是军队同中央文革斗争得来的”。孔的揭发等于说陈早有反中央之意，成为对陈上纲上线为“反党分子”的材料。当年武汉的运动，直到酿成“7.20”事件，孔庆德作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许多事是经他报到军区党委和由他具体操作，有些事陈再道并不清楚。而孔把支左中的事情一古脑推到陈身上，说陈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陈再道从批判会回到住处，气愤地对当时也被打倒了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说：“孔庆德把他自己干的事也往我身上栽，一些事，不是他在批斗会上说，我都不知道”。孔还在许多会上说陈“一贯是三分分

子”。陈后来说：“他（孔庆德）说我一贯是三反分子，他过去总说紧跟我，那他也不是三反分子？”“四人帮”垮台后，中央为“7.20”事件平反，孔庆德又把“7.20”前抓捕造反派当作自己的功劳，在《一代将星孔庆德》中就公然宣称，抓捕社会上造反派是孔提议的，具体抓人方案是孔主持制定的。

“7.20”事件后的武汉地区军队干部学习班还吸收了一些当时军内外的造反派参加。这些造反派都认为孔庆德对陈再道反戈一击有功，认错态度积极鲜明。68年6月后，曾思玉在武汉军区开始整治造反派后，孔则说自己原来在学习班里就同造反派作斗争。姚哲、韩东山对此嗤之以鼻。孔在学习班时当着姚、韩对造反派连说带做地表示低头认罪，造反派拿孔的态度与姚、韩作比较，说姚、韩态度不好。

文革过去30年，人们终于悟出来：原武汉军区领导人中，只有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孔庆德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陈再道、钟汉华和李迎希相继被打倒，唐金龙被逼死，杨秀山因贺龙问题遭关押，张广才、毕占云被停止工作逐出武汉（张死在恩施，以席裹尸……），姚哲、韩东山、叶明等在曾思玉主政期间相当于靠边站。只有孔庆德因“7.20”以后出卖陈再道、诬陷李迎希，获得曾思玉的信任，成为原军区常委中唯一不受曾思玉排斥的人，以至1970年还当上了湖北省委书记。

但在1974年初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后，孔则说：“我是被曾、刘整的”。

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总结教训，首先是不应掩盖历史真相。李迎希固然有错误，但完全不是《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所说的那样。而孔庆德老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自己的道德取向，即使不写到《一代将星孔庆德》中去，起码也应扪心自问一下吧？

~~~~~

【争鸣讨论】

《一代将星孔庆德》诉讼案及判决是怎么回事？

• 信汉生 •

据武汉消息，《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于2001年1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全国发行；由于该书中有攻击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的内容，李迎希的子女于同年五月写信给广州军区党委反映，要求对此问题严肃处理。后根据广州军区有关部门关于由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协调、达到双方私下和解的意见，李的子女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被置之不理。据悉，《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是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自筹资金，委托屈德骞、郑珠滨二人执笔，根据孔的口述和所提供的资料撰写的。

李的子女于2002年6月向武昌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告孔庆德、屈德骞、郑珠滨和解放军出版社名誉侵权。

武昌区法院于2005年5月30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前，武昌区法院通知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将采取不公开开庭的办法。原告因法院不能拿出不公开开庭的理由，表示异议，但法院仍采用了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原告方面出庭的是李迎希子女及律师，被告方面出庭的是孔庆德的子女及律师（代表孔庆德、屈德骞、郑珠滨）、解放军出版社代表。

在庭审中原告诉称：《一代将星孔庆德》关于李迎希的叙述是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对李迎

希进行了诽谤。同时，该书指李迎希“夺权”，违背武汉军区党委1981年5月8日《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81）8号文件），是借写书翻案。

被告辩称：《一代将星孔庆德》关于李迎希的叙述是记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对李迎希的恶意中伤。武汉军区党委为李平反的文件是对文革中将李作为“反党夺权”审查批斗进行平反，而《一代将星孔庆德》只是说李“夺权”、“抢班夺权”，并未说李“反党夺权”。被告提供了几个文革时在武汉军区机关工作的人员作证人证言，证明《一代将星孔庆德》有关叙述是“实事求是”。

《一代将星孔庆德》关于李迎希的叙述是事实，还是诽谤？下面将该书涉及李迎希的三段内容全部抄录如下：

第一段（399页）：此时，大军区机关尚未批准开展“四大”，是坐下来学习，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但在造反派的搅扰下，也是人心浮动。首先是政治部有几个人就在活动开会，有个军区领导也参加了会，并喊起“造反无罪”、“革命有理”的口号。有人戏称他为“少将红卫兵”。孔庆德得知，去把他拉走，说：“你是军区常委，不能这样干！”

按以上叙述，李迎希这个“军区常委”不是糊涂之极，就是有意乱军；孔庆德则十分高明，坚决制止了李的错误做法。

而在证人证言中只有一个人的证言涉及到书中的这段内容。这个证人是孔庆德的汽车驾驶员刘治岭。他的证言如下：

1966年地方搞文革，军队很平静，有天晚上，突然首长都到了政治部，到2号楼，首长上楼开会，上去大约半小时后，李迎希下来了，他说：“你们还想压我呀，我已经造了二十多天的反了”。开完后，各回各的家，孔司令经过李迎希家时，孔进李家，李迎希当时是第一副司令，大家都很尊重他。

刘治岭的证言提到他见到的一些他自己并不知来龙去脉的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迎希参加的会是军区首长们的会，不是造反派擅自组织的会；也没有孔庆德教训李迎希“不能这样干”这回事。

第二段（402页）：1967年2月6日，那位曾经参加过政治部造反派开会喊出“造反有理”的军区领导，在造反派的簇拥下，趁司令员、政委赴北京开会之机，召开千人大会，公开站出来揭发陈再道、钟汉华跟随叶剑英、罗瑞卿搞大比武的“罪行”。随后又在他家中与造反派的头子们秘密开会，勒令在家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姚哲（主管作战）交出军权。但作贼心虚又怕死，便逼迫军区党委的常委们签字，保证他的安全。孔庆德拒绝签字，愤然道：“你自封司令，谁下的命令？你的安全自有保卫部负责”。他最后甩下一句话：“老革命竟这么蠢！”拂袖而去。

被告的证人证言，一不能证明二月六日的千人大会是李迎希召开的或是李迎希伙同造反派召开的；二没有证明李迎希在这个大会上“揭发陈再道、钟汉华跟随叶剑英、罗瑞卿搞大比武的‘罪行’”；三不能证明李迎希为“夺权”“与造反派头子们秘密开会”；四没有证明孔庆德对李迎希说过什么：“你自封司令”、“老革命竟这么蠢”等大义凛然的话。如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曹之，在证言中说得很直白，他说李迎希在二日六日为夺权同造反派秘密开会的事“是我听说的”。而且这些证人证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牵强附会，凭感觉说事，甚至超额编造。如原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刘东森在证词中说：“67年2月6日开大会时，李迎希跳得很高，说

‘红司令到’”。

第三段（445页、446页）：（孔庆德等武汉军区领导人于一九六八年春从北京学习班回汉后——笔者注）在四所住下后，每隔几天，刘丰和那个曾经造反夺权的副司令员就来要孔庆德等人交代问题。这时，孔庆德的态度硬了：“在北京时，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有几次批斗会你刘丰也参加了，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当场把刘丰顶得哑口无言。那位夺权的副司令员，在军委解决武汉问题时，被留在了北京。

以上这段内容，在孔庆德找来的证人证言中完全找不到证明。至于这段内容中“那位夺权的副司令员，在军委解决武汉问题时，被留在了北京”，只有原告提供的武汉军区党委为李迎希平反的正式文件能说明这段历史，该文件指出：从1968年6月开始，李迎希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这就证明《一代将星孔庆德》中说李是“夺权的副司令员”，是诽谤，是在搞翻案。

2005年8月9日，武昌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根据庭审审查的证据，该书部分章节中引用了“老革命竟这么蠢”、“自封司令”、“戏称少将红卫兵”、“做贼心虚”、“造反夺权的副司令员”、“那位夺权的副司令员”等语句对李迎希不点名的描述部分是事实，其所用的上述语句均是文革期间比较流传的语句，该书也仅仅是引用了该部分语句，并未对李迎希的行为进行恶意中伤，也未贬损李迎希生前的名誉和荣誉，故不构成对李迎希名誉权的侵害。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是，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判词等于说，法院认为：李迎希就是“这么蠢”、李迎希在文革中“自封司令”、李迎希是“少将红卫兵”、李迎希因夺权“做贼心虚”、李迎希的问题在于他是个“造反夺权的副司令员”，因为法院认为这些是“事实”，所以《一代将星孔庆德》的描述不算“恶意中伤”，不构成名誉权的侵害。法院这样认为是“根据庭审审查的证据”，其实就是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但是，为什么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即“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81）8号文件”视而不见？

是不是找几个有不同看法的人写个材料，也就能推翻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决定，任凭这些人诬蔑刘“叛徒、内奸、工贼”呢？可能问题不在武昌区法院……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